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与丰饶的象征

“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文化体系，它在经济上以财产制度和商品生产为核心，在文化上以交换关系即买卖关系渗透到几乎整个社会这个事实为基础。”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曾经说过，静态的封建主义是一个历史事实，一个静态的社会制度，一种历史可能性，但是静态的资本主义从修辞上来说是一个历史矛盾体。”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 14、240 页，1976 年著）

“社会政治冲突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它将是养尊处优的财产拥有者与被剥夺者之间的冲突。”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经济时代的历程》，1994 年著）

“迟早将袭击一个国家的核心和大脑并使之毁灭的那种疾病是利己主义，是那种充分意识到个人或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攫取个人财富的利己主义。”这句话是列宁

说的还是斯大林说的？它既不是列宁说的，也不是斯大林说的，而是发明安全剃须刀的百万富翁金·吉列 1910 年说的。那时亨利·福特总不愿意看到自己同金·吉列之间出现严重分歧。

难道列宁或马克思说过：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挥霍自己的财产，毫无限制地奴役他人，迫使他们干“一切似乎对自己有利的工作”，是错误的吗？列宁没有，马克思也没有。口出此言的正是 20 世纪初德国富有影响力的著名企业家、腰缠万贯的瓦尔特·拉特瑙。

本章将讨论另一种资本主义和另一句格言，它们虽然发生在本世纪，但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资本主义取得了出乎意外的胜利

20 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社会有 6 个特征：经济在经历了战前的多次失败之后取得了巨大成功；室内外生活条件的标准的提高；全球性联系；不同文化之间的可沟通性；转变和改造能力；此外，还有预见能力的有限性。

本世纪下半叶，开放的民主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和商业的需要，在西方、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其结果是，可能使民主受到损害的正是民主的这种过猛发展势头，而不是民主的缺乏。

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许多事件都在不断地赋予民主以新的内容。苏联及其附属国把马克思自己的“过渡性原则”（《哲学的贫穷》）抛置脑后。这条原则说“概念和范畴并不比它们所表述的关系更加永恒。

它们是历史性和过渡性产物。”

俄国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在 1850 年说，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将历经自己所有的发展阶段，最终走向极端，变得荒诞不经。“然后，将从少数派反叛者的巨大胸膛里爆发出一声断然拒绝的呐喊。随之将再次出现一场道德方面的论战。”⁽¹⁾

就在 1941 年德国进攻苏联前夕，即距苏联解体大约 50 年前，美国政治家詹姆斯·伯纳姆说，尽管苏联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但是其弱点则更加突出。苏联工业的落后局面不能仅仅通过其质量低下的有形设备来衡量，还必须通过其合格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相对匮乏来衡量。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可能使这个新的国家机器产生出一批极其卑鄙的野心家。他认为，官僚主义的贪婪、腐败和不折不扣的愚蠢在俄罗斯普遍存在：他得出结论说，这些弱点将足以表明，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²⁾。这个预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道德革新的世纪

这个世纪是道德大革新的时代。尽管个人行善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但是国家之间的善举还是全新的事物。尽管殖民主义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国际援助无论如何都将给它致命一击：因为殖民思想与国际援助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出于历史的必然，国家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正好与商业的国际化 and 跨国性质同时应运而生。

“马歇尔计划”从许多方面改变了 20 世纪的世界面

貌，但是人们几乎已经忘掉了在该计划诞生之前出现的一个仁爱征兆：⁽³⁾1921 年，新生的苏联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之下。是年 7 月，时任哈定总统商务部长的反共人士赫伯特·胡佛接到了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个人请求。令人吃惊的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俄罗斯的“各个城市里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群。仅在彼得格勒，每个月就有多达 10 万人因饥饿而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现在，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粮食资源；但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僚政府却不能向需要粮食的地方提供粮食。新生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触目惊心的饥荒，它以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为中心，向四周蔓延。这场饥饿部分是由于怪异的天气引起的，但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陷入停顿而引起的，因为苏维埃政权正在迫使农民走共产主义道路。列宁当时写道，如果没有国际援助，‘政府将灭亡’”。

“胡佛回顾道：‘在（美国）国内，我们正在史无前例地大把大把花钱。因为我们所征税收之多，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临着失业问题，我们还面临着解除全国战备状态以后军人复员所带来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人民呼吁……冻结这种援助开支。’但是，美国的大规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截止到 1922 年春，1800 万俄罗斯人有了粮食吃。”在美国，大约 200 名具有救援工作经验的志愿人员被召集起来。在高峰时期，约有 600 名美国人参加了援救工作。美国救援机构雇用当地的苏联工作人员负责把救援物资通过铁路从海港运送到全国的各个分发地点。而美国的工作人员则对他们进行监督。最后，救援工作建立了一个由 1.8 万个分配站组成的分配网络，总共提供了 7 亿吨粮食，还有大量药品和商品。

这些物资足够 1800 万俄罗斯人吃用 3 年，并拯救了 1000 万至 2000 万生命。

后来，马克西姆·高尔基给胡佛写信说：“据我所知，在人类全部的苦难历史中……没有任何成就能在规模和慷慨程度上与您所提供的救援工作相提并论……您的帮助将作为独一无二的巨大成就载入史册，无论怎么称颂也不会过分，并将永远铭记在千百万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您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但是斯大林却采取了措施，使这个壮举没有保留在千百万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的俄罗斯人的心中。

还是在俄罗斯，从 30 年代初开始，在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先例，当时欧洲提出把欧洲单一货币单位——暂且称之为“欧元”——作为统一货币。欧元既不是马克，也不是法郎、里拉、弗罗林或英镑，而是（至少刚开始时是）所有这些货币单位和其他一些货币单位的一种综合尺度。在 30 年代，中国东部铁道的所有权虽然归苏联和中国双方共同所有，但是由苏联管理。可是，苏联那种我行我素的管理方式对任何一种当地货币都持不信任态度。它于是便发明了自己的货币“金卢布”。金卢布既不是黄金，也不是卢布，而是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著名货币的平均尺度。⁽⁴⁾

但是最早（1758）和最具意义的预言是戴维·休谟的预言。休谟质问：当工资较低的不发达社会学会模仿先出现的社会和先进社会的“机械艺术”时，“国家的相对优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由于具有惊人的预见能力，休谟早在工业化浪潮席卷英国等沿海国家很久以前就提出了这个疑问。W. W. 罗斯托说：“考虑到商人要

把后来者掐死于摇篮之中的本性，休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先行者如果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就能享受到发展双向贸易所带来的优势；但是如果要在不可避免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按休谟的话说——（他们）就必须‘勤奋和文明’。⁵⁾

“旧的秩序发生了变化，让位于新的秩序”

本世纪的主要创新之一是资本主义具备了现代特征。

在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上半叶，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价值和观点与我们现在的观点大相径庭，发现这一点的不但有学术研究人员，而且也有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我们的资本主义。

大规模生产所创造的奇迹对他们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生产——又称“工厂制度”、“机器制度”、“生产主义”或“生产效率主义”——是一个具有魔力的新发现。它揭示出：贫穷国家的需求可以通过物质极大丰富的工业前景来满足。因此，大规模生产是为博爱服务的。

但是，我们不会用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来取代我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因为我们将看到，一些人认为，柏拉图式的严厉监护制度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西斯主义非常相似。

学术界的第一个见证人是索尔斯坦·维布伦（1857—1929）。人们可能已不大记得维布伦这个人，但对他创造的“夸耀性消费”和“夸耀性浪费”这两个词却铭

记在心。我们之所以记住了这些词语，是因为相对于维布伦时代而言，它们在今天具有更大的力量。那个时代属于夸耀性的东西如今则变成了具有危险性的东西。

维布伦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是挪威人的后裔。他的英语始终带有挪威语的那种轻快节奏，一生都没有改变。正如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评论家所言，维布伦自始至终是一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在他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位“访问者”，因为他经历过一场失败的婚姻，因为他违背了其他的社会主流举止等等。他在晚年时获得了荣誉，但是与现有社会格格不入这条线索始终贯穿着他两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批判作品：《有闲阶级论》（1899）和《企业论》（1904）。

他说，“工业”或“机器制度”要求纪律、社会服从和效率。这与经济控制这种古老的野蛮行为是不可调和的。“压制机器制度将把企业逼至绝境；而如果让机器制度自由发展，企业经营原则就会马上陷入停滞不前。”^⑥他说，无论是停止不前还是继续前进，结局都是毁灭。

“机器制度”是维布伦时代的关键概念，也是另一位敏锐观察家格雷厄姆·沃拉斯 1914 年提出的一个根本概念。沃拉斯（1858 - 1932）是英国人，他和维布伦属于同一个时代，但他作为一位充满希望、富有爱心的社会主义温和派人士，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过，他和维布伦一样，也是怀疑论者，他撰写了《论政治学中人的本性》（1908）和《伟大社会》（1914）这两部著作。他意识到机器制度对文明产生的影响，并感到建立庞大的令

人满意的群体组织是不可能的。由于“聚敛财富的本性没有任何明确的界线”，我们必须最终选择要么生活在较小的社会里，要么生活在较大的社会里，在享受其好处的同时容忍人们经常发出对人际关系的不满。⁽⁷⁾

大约 30 年后即 1942 年，另一位观察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 – 1950）撰写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捷克裔奥地利人熊彼特是一位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过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但任职时间不长。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熊彼特仍然把我们的社会视为由强大的大规模生产企业组成的文明社会，是一个财富分配不均、自愿接受失业的社会。他说，这种文明是注定要消亡的，不是因为它的过错，而是因为它的优点和它在“毁灭创造性”时取得的成功。他坚持认为，收入增加削弱了企业家的地位，并使他们的人数出现了过剩。他们的地位被官僚们取而代之。与维布伦不同的是，他认为“资本家的活动从根本来说上是‘理性的’活动，它们趋向于传播符合理性的心理习惯并摧毁其下属的……那些习惯……这些习惯对生产工作领导层……有效工作是必需的……”。一个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阶级出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充满仇恨。资本主义削弱了家庭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本身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削弱。政府可以采取干预措施，实现收入平等化，并采取措施以确保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毁灭资本主义的正是这些政策本身。因此，社会主义最终将替代资本主义。

熊彼特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价值结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明——不平等和家庭财产的文明”。⁽⁸⁾总

的来说，这有点言过其实：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价值结构”，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个关键程序、一个价格和分配体系。资本主义是文明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主要部分，也不是全部。资本主义是一个定义，但它本身却无法定义。我们将在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来看看企业家的观点，他们中较为突出的有瓦尔特·拉特瑙、老亨利·福特、金·吉列和欧内斯特·索尔维。

瓦尔特·拉特瑙：“经济是命运”

瓦尔特·拉特瑙的父亲埃米尔（1838 - 1915）创立了德国的爱迪生公司并在 1887 年把它更名为通用电气公司。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英国通用电气公司（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齐名。他还和维尔纳·冯·西门子一起共同打下了西门子公司和德律风根公司的基础。瓦尔特（1867 - 1922）在 20 世纪初从他父亲手中接过董事长职务，并把通用电气公司塑造成一个庞大的公司帝国。他把德国工业的战时供应政策演变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行动（他凭借手下的三个机构使自己的力量增长了 3 倍，这些机构分工协作，其威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要强大得多）。拉特瑙在战后担任重建部长。1922 年，已成为德国外交部长的瓦尔特被法西斯分子枪杀；他们愚蠢而错误地认为，他们谋杀的是犹太世界公民、坏蛋瓦尔特·拉特瑙，而事实上他们谋杀的是德国爱国者、好人瓦尔特·拉特瑙。涉嫌谋杀拉特瑙的罪犯之一、作家欧内斯特·冯·所

罗门因此悔过自新，后来变成了和平主义者。

拉特瑙本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对资本主义持既欢迎又批评的态度。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见证人认为，尽管他是“75%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仍然是一位贵族和民族主义者”。⁽⁹⁾拿破仑认为“命运即政治”，拉特瑙则不同，他认为“经济即命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领袖都认为，经济和大规模生产是建设美好未来的关键。当时的知识中产阶级也许会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但是拉特瑙等资本家只是拒绝接受它的某些纲领。

他在1918年写下了这句话：“如果我们每年花20个亿到30个亿买酒喝，耗资亿万购买饰物、看演出和购买个人首饰，让成千上万名体格健全的售货员呆在大城市的商店柜台里无所事事，或是让数十万商人年复一年地坐在奔驰的列车里浪费时间，在同行之间展开竞争，临到年末却发现每家公司的销售量与上一年不相上下——那么，我们将把国民的储蓄挥霍得一干二净，把整个生产过程引入歧途，分散劳动力，浪费物质资料，阻碍资源的流通，增加生产成本，并减少外部竞争。”⁽¹⁰⁾

他对小公司持不信任态度：“提高经济伦理道德水平的第一个小措施是，非个人（主要由公众持股的）公司证明没有股份集中的（小）公司那么多的欺诈和虚假广告。”

他在另一部书中继续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大公司的经理们“即使在与企业脱离关系很久以后也在为时代谋福利”。“如果要他们在增加一倍薪水和担任经理即企业高级官员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将选择责任，而不会选择

财富。”“作为动力，阴谋诡计已完全被责任感所取代。”^(11、12)现代观察家们很难毫无保留地赞同这些观点。它们反映了福特的类似观点，尤其是金·吉列的观点：从市场心态来说，大企业是值得信赖的财产承受者，小公司是不值得信赖的财产承受者。

拉特瑙的另一句名言仅仅过了几年就得到了亨利·福特的响应：“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消灭更具灾难性的贫穷和贫困这个义务。土地依然十分富饶，人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粮食、衣服、工作和闲暇时光……”⁽¹²⁾这就是“丰饶的象征”理论。20世纪末几乎没有人响应这个理论。

既然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中重新回到有关贫穷的论述，我在此提一下拉特瑙的不满：在未来，人们将发现越来越难以理解，死者意志的枷锁怎么会套在生者身上。肆意挥霍自己的财富、毫无限制地奴役他人、让人“干一切似乎对自己有利的工作”等等，都是错误的——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竟然表现出这种反传统的情感，实在是匪夷所思。

尽管我在第二章中论述另一个主题“进步观念”时引用了他的怪异言论：“在不断变化的组合中，资本主义、发明、加尔文主义、犹太教信仰、奢侈和奴役妇女相互交错，成为事件发展进程中所谓的进化因素。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按照这种方式，一个奇迹总是不断地从另一个奇迹中获得解释……”这是拉特瑙在1916年管理德国战时经济时说的话。他所阅读的书籍是最具有现代思想的；毫无疑问，这里指的是两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好友兼对手维尔纳·桑巴

特的著作。韦伯出版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1945 年 5 月），桑巴特则发表了《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911）和《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

拉特瑙认为，消费与其说是个人行为，不如说是群体活动；财产和收入应该更加平等；应当消灭垄断、投机和继承财产，限制奢侈浪费。最后，拉特瑙转变成了一位工联主义者，他的主张如果得到实施的话，将与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相似。拉特瑙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称自己的主张为“所有权的非个人化”思想，而列宁作为共产主义者，则主张“共同拥有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

亨利·福特：“并不是人人都追求财富”

现在来看看亨利·福特（1863 - 1947），他在 20 世纪写下了上面那个句子。⁽¹³⁾

他说：“我追求的是简朴。总的来说，人们非常贫穷，哪怕是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也需要花费巨大开支（更不用说购买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的奢侈品了），因为我们生产的所有产品几乎都过于复杂。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食品、我们的家具——所有这些都可以比现在更加简单些，同时更加美观些。”（拉特瑙也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接着说：“我们正在逐步走出对物质财富的崇拜。致富已不再是一件荣耀的事。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追求财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金钱至上。当然，他们不会对金钱感到恐惧，也不会对金钱的所有者感到恐惧。我们通过无谓的盈余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并

不能使我们产生荣誉感。”这实际上是福特对“财富的福音”的解释。在此之前，匹兹堡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曾说过：“百万富翁如果在去世时仍然是富翁，他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福特也同样倾向于赞同工团主义思想，蔑视竞争。他说：“无论什么工作，都应该由最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来干。”但他没有指出“最胜任”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其次，利润不应该实现最大化：“生产过程并不是低买高卖。它是一个公平地购买材料、尽可能地减少成本、把材料变成可消费的产品并把它提供给消费者的过程。”

在他们那个时代，那些随波逐流的漫画家是一群难以理喻的人。福特和拉特瑙把那个时代所接受的观点拿过来，然后给它们注入新工业主义思想。

金·吉列：竞争是社会疾病

但是，另一位观察家、安全剃须刀的发明人金·吉列（1855 - 1932）却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认为他们荒诞不经。尽管金·吉列在著书立说方面比福特和拉特瑙早好几年，但我还是几乎把他放到最后来讨论；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对他们的理论加以比较吉列根据推理的同一性原则得出许多优秀的结论。

同拉特瑙一样，吉列也反对竞争。吉列的助手 M.L. 西弗里在被解雇前曾说，“竞争是不文明的、不道德的、堕落的、不公正的、不平等的、罪恶的、浪费的、残酷的、变化莫测的、混乱的和没有效率的”。⁽¹⁴⁾他显然非常赞赏使用这些近义词来描写竞争。3 年以

后，即 1910 年，吉列本人写道，“迟早将侵入国家的心脏和大脑并使之毁灭的这种疾病就是个人主义，是认识到个人或国家为攫取个人财富而展开竞争的那种个人主义……”，“工业机器的真正目的是提供生活必需品。”“不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工业都是浪费。”

吉列比拉特瑙更崇拜大公司。他说：“节约、稳定和没有摩擦是大公司的典型特征。”“美国钢铁公司消灭了贪污浪费现象。”“看看周围。看看人们在干些什么。

（然后）再看看美国钢铁公司、铁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食糖托拉斯公司、电话和电报垄断公司等成千上万家公司，这些公司和谐相处，把大笔金钱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用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集中地运用智慧和力量。（它们）正在变无序为有序……”“如果把持股人排除在外——持股人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公司运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美孚石油公司就是政府合理工业体系的一个典范。”“本世纪铸就的一个巨大错误就是制定了对集中施加限制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¹⁵⁾

他更加异想天开的主张之一是建立“世界公司”。世界公司“注定要把全世界的教育、工业和政府统一于同一个体系之中，把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融入同一个法人团体，它拥有同一个法人意向……无论他们属于什么国籍、种族、宗教信仰、肤色、年龄和性别。它以金钱为标准，而不是以个人为标准”。它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工业大熔炉”，成为“劳动力的惟一雇佣者和产品的惟一销售者”。它将成为“千百万心灵的物化象征，他们集中在一起，相互和谐地工作，它的机制将是如此神

奇、如此美妙，以至于我们只要一意识到它的存在，就能心领神会”。

“公司职员 of 法人意向将控制、指导和管理这个世界的整个工业领域。”“在‘世界公司’领导下，（美国）多达 500 万的农业劳动力将组成一个个‘兵团’，在熟练农艺师的监督下进入各个公司和各个分公司……。”

吉列是一个想法奇特的人。根据他的思想，国家将发展成类似黑格尔提出的合法王权——只是他的“世界公司”完全取代了国家如果我们把吉列的“世界公司”换成马克思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斯大林的解释），实际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欧内斯特·索尔维和“生产效率论”

欧内斯特·索尔维（1838 年 – 1922 年）是比利时的温和改革派人物；如果认为前面提到的 3 位人物是离经叛道的荒谬论者，那么索尔维的理论则非常符合目前的观点。索尔维 1863 年发明了一种生产苏打灰的化学方法并因此成立了卡特尔；他在许多国家生产苏打灰，这种产品为他带来了滚滚财源。但是他反对继承财产。他提出用社会会计体系来替代货币。他组织了一些著名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德布罗意、詹姆斯·金斯爵士、卢瑟福、居里夫人等。

19 世纪 80 年代，索尔维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信仰：“……未来属于大公司和为公共权益服务的机构；为了赢得一个安全的未来，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一位

编年史学家说，索尔维认为社会进步主要取决于大规模生产。作为“大”的反对力量，索尔维“捍卫迅速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工人阶级的某些支持者却不以为然，因为虽然索尔维为他们的事业辩护，但他不属于他们的政党。索尔维使自由主义者感到震惊，使保守派感到害怕”。⁽¹⁶⁾

在本世纪最初的 10 年里，索尔维把自己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合理化”理论取名为“生产效率论”。他并不是大言不惭的人，但他在 1879 年写就、并经常被人引用的一封信中说：“我必须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上述 4 位企业家是现已基本消失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自那时以来，资本主义就其发展过程和关键程序来说已经发生了变化。旧的秩序改变了，并被新的秩序所取代。他们眼中的伟大现实——权力、机器制度、规模化生产、“生产效率论”、实现标准化消费的可能性、土地的富饶等等——不是消失了，就是退化了。他们开出了五花八门的药方，但这些药方对我们今天来说，已不再适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资本家是“社会主义的先导”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这是政权与规模化生产相结合的简略说法。但是列宁在关于人民财富的来源方面同吉列、福特、拉特瑙和索尔维持相同观点：大规模生产的生产率。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列宁，都

对一般商业持鄙视态度。列宁还在国民财富的创造方面和他们持几乎相同的观点。在列宁看来，可把苏维埃政权视为“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事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后续事物”。⁽¹⁷⁾他问道：“苏维埃政权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吗？它们能和睦相处吗？当然可以。”⁽¹⁸⁾与 20 世纪末民主资本主义理论相比，福特和拉特瑙与列宁的观点更加接近。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的真正先导不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分子和鼓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人。”

列宁正是从工业的观点出发缔造了一个国家。这是一种资本主义观点。虽然我们现在的经济秩序抛却了 20 世纪初的这个“丰饶的象征”观点，但是它却成了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原则，并且从未改变过。数量仍然是理想目标；苏维埃政权机构这个独眼巨人对均衡发展型经济的所有其他特征——质量、机会成本核算、竞争、服务、效率、维护和分配——均视而不见，“他”的眼睛只盯着庞大的总产量。苏联在 70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这个原则，试图使它发挥作用，但却不尽人意。

政治史学家们可能认识到，人们对技术奇迹和技术专家优越性的迷信可以追溯到圣西门（1760 - 1825）时代，查尔斯·傅立叶（1772 - 1837）也早就谴责过竞争的罪恶。这些史学家也可能倾向于得出结论说，从 18 世纪末一直到本世纪下半叶，在世界经济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也许正是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今天所持的观点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荷兰，更接近于他们的贸易方式和对金钱的观点，而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欧洲、美国